

金瓶梅考论

黄

霖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金瓶梅考论

Jinpingmei Kao Lun

黄霖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252,000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 插页：2

印数：1—1,237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徐 彻 常 晶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李勤学 版式设计：赵耀今

ISBN 7-205-00517-5/I·33

定 价：3.90元

序 言

章培恒

《金瓶梅词话》是我国小说史上的一部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作品。然而，由于来自“左”的干扰和传统思想的影响，或者说由于封建传统思想在“左”的旗帜下的加强，它在建国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却被目为淫秽、反动小说而受到口诛笔伐。与几十年以前鲁迅先生、吴晗先生对此书的评价——前者誉之为“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同时说部，无以上之”^①；后者称其为“现实主义作品”^②——相比较，这很难说是一种进步。幸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学术界重新开展百家争鸣，《金瓶梅词话》的研究才得以复苏，而且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了重大的发展。黄霖同志就是为此而付出了艰巨劳动的一位研究者。现在，他近年来所写的有关论文即将结集出版；作为同行，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关于《金瓶梅词话》，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它的作者、时代、思想内容、艺术价值、人物形象、版本流传、评点者等等，都有许多值得进一步探索之处。也许可以说，我们对这部书所知道的实在很少。因而，在这方面的耕耘具有某种程度的开荒性质。黄霖同志的一系列论文，对于上述问题几乎都提出了他的以大量资料为依据、经过深思熟虑的答案。在这些答案中，包含着许多发前人所未发的、令人赞叹的见解。

也正因此，黄霖同志在这领域中堪称自成一家，已经形成了他自己的体系。他的有些看法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对于《金瓶梅词话》的研究来说，这部书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

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他的结论都是金科玉律。恰恰相反，他所提出的，许多都不能视为定论——至少在目前是如此。他的见解中，越是影响大的，在学术界越是有争论；他的关于《金瓶梅》作者的考证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我想，这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只有那些四平八稳的、毫无新意的论述才不会引起异议，同时也不会引起重视。凡是具有独特之见的，往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讨论才会取得一致或比较一致的意见，对新说加以肯定或否定。黄霖同志所提出的答案，许多都还处在讨论的过程中。

然而，就学术研究说，值得讨论本身就是一种价值。那经过讨论而证明其为正确的，固然是真知灼见；就是经过讨论而证明其为谬误的，在谬误中也一定含有若干可贵的东西（或者是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考，或者是前人所没有发现的重要材料），否则就不会受到学术界的注意而引发争论。所以，无论如何，黄霖同志的这一系列论文对《金瓶梅词话》的研究都将是有力的推动。即使他的某些看法最后被证明是不能成立的，但他所用以论证自己看法的材料和思考问题的方法，仍将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在黄霖同志这部论文集行将出版之际，我除了喜悦、赞美之外，更由衷地希望它的出版将是《金瓶梅词话》的研究受到学术界进一步重视的象征。

① 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② 见吴晗《〈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

目 录

序 言	章培恒
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	(1)
论《金瓶梅词话》的政治性	(38)
附录 金瓶梅的政治讽喻	魏子云 (52)
《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论	(58)
《儒林外史》对《金瓶梅》的继承和发展	(76)
《金瓶梅词话》人物小论十题	(92)
肉欲狂潘金莲	(92)
情孽种李瓶儿	(97)
婢作夫人庞春梅	(102)
克尽妇道吴月娘	(107)
孟玉楼是乖人	(111)
孙雪娥是不平人	(115)
帮闲应伯爵	(119)
粉头李桂姐	(125)
奸滑浪子陈经济	(129)
良心尚存宋惠莲	(134)
关于《金瓶梅》传世的第一个信息	(140)
《金瓶梅》原本无秽语说质疑	(145)
——与朱星先生商榷	

《忠义水浒传》与《金瓶梅词话》	(151)
《金瓶梅》成书问题三考	(170)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	(199)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续	(218)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	(232)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答疑之二	(240)
附录 屠隆是《金瓶梅》作者	魏子云 (245)
论屠隆罢官及其雕虫罪尤	魏子云 (249)
——屠隆可能写作《金瓶梅》的动机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	徐朔方 (276)
《金瓶梅作者屠隆考》质疑之二	徐朔方 (280)
也谈《金瓶梅》中的一诗一文	张远芬 (285)
——与黄霖同志商榷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	(289)
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	(302)
《金瓶梅》流变零拾	(324)
冯梦龙与《金瓶梅》的刊印	(324)
影松轩本《第一奇书》	(327)
满文本《金瓶梅》的译者	(330)
《真本金瓶梅》与王文濡	(335)
后 记	(342)

我国暴露文学的杰构《金瓶梅》

(一)

在我国文学史上，《金瓶梅词话》的最大特色是什么？曰：暴露。它第一次全心全意地致力于撕破笼罩在现实世界上的种种真美善的纱幕，把上上下下、内内外外的人间丑恶，相当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因而不但能使当时的读者感到震惊，起来诅咒和希望改变这样的现实，而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它仍不失为人们认识社会的一面镜子。直到本世纪的三十年代，郑振铎先生还一再强调：“《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们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谈金瓶梅词话》）这正说明了暴露乃是《金瓶梅》的主要价值所在。

本来，文学的使命就在于形象地再现生活，评判现实。生活虽然并不都是假丑恶，但在漫长的存在着剥削和压迫的社会里，的确到处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腐烂气息。这诚如契诃夫在《写给玛·符·基塞列娃》信中说的：“讲到这世界上‘充斥着坏男子和坏女人’，这话是不错的。人性并不完美，因此如果在人世间只看见正人君子，那倒奇怪了。然而认为文学的职责就在于从坏人堆里挖出‘珍珠’来，那就等于否定文学本

身。文学所以叫艺术，就是因为它按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它的任务是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因而，暴露社会的黑暗，特别是暴露统治集团的丑恶灵魂及其嘴脸，一开始就自然而然地同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能经久不息地颤动着善良人们的心灵。有人说：“如果你表现不出一代人的所有卑鄙龌龊的全部深度，那时你就不能把社会以及整个一代人引向美。”（果戈里，见《果戈里及其讽刺艺术》）这话是有道理的。作家致力于暴露丑，正是要把人们引向美。然而，作为单独的一件艺术品，从《诗经》的《硕鼠》到关汉卿的《窦娥冤》，由于受到文学样式的局限，往往只能集中火力暴露社会黑暗的某一点或某一方面，而不大可能在广阔的背景上把整个社会和盘托出，使人们比较全面和细致地看清其真相。长篇小说的出现，为广泛地暴露现实开辟了途径，但人们一开始并没有运用这一武器来无情地解剖世界，卑劣奸险的统治集团也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和破坏自己在文学作品中现形。于是，有人就宣扬小说是一种“太平乐事”，欣赏象宋仁宗那样“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郎瑛《七修类稿》），也有人鼓吹编载“英君名将忠臣义士凡有关风化者”，让“愚夫愚妇”顶礼膜拜（林瀚《隋唐志传通俗演义序》）。这种统治阶级的思想，不能不对长篇小说的创作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在这里，我无意将《金瓶梅》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后来的《儒林外史》、《红楼梦》分一高下。它们出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各有特色，各有成就。但就暴露我国封建末世这一点来看，《金瓶梅》并不如前于它的长篇那样有意去歌颂君明臣良，去描绘对被压迫者说来不太现实的理想世界，乃至最后涂上一丝光明的色彩，拖上一条圆美的尾巴。至于与后于它的一些暴露名篇相较，从其暴露范围之广，其批判锋芒之

锐，特别是敢于连曹雪芹都不敢的“汕谤君相”、“伤时骂世”来看，仍然能显示出它的焕发光彩和撼人力量。这就难怪鲁迅先生给《金瓶梅》的暴露艺术以极高的评价，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金瓶梅》的确是一部我国暴露文学史上一时间“无以上之”的杰作。

《金瓶梅》暴露现实之所以杰出，首先就在广度上显示出来。这部小说在着重剖析西门庆及其一家的同时，把那把冰冷、犀利的解剖刀多层次、多角度地触向了整个世界。上至朝廷，下及奴婢，雅如士林，俗若市井，无不使之众相毕露；其社会政治之黑暗，经济之腐败，人心之险恶，道德之沦丧，一一使人洞若观火。这真是达到了鲁迅所说的“著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的境地。

我们先就解剖西门庆这一角色来看一看那个鬼蜮世界吧。西门庆原是个开生药铺的浮浪子弟。小说开始时，说他由于“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这里点出的“发迹有钱”和“交通官吏”两点，可以说就是这个十恶不赦的西门庆不但没有受到社会惩罚，反而能称霸一方、步步高升的两大法宝。他就是靠勾结衙门来拚命敛财，财越积越多；又凭借钱财来贿赂官场，官越攀越高。于是乎，他肆无忌惮地淫人妻女，贪赃枉法，杀人害命，无恶不作，最后因纵欲过度，暴病身亡。西门庆一生暴发暴亡的历史，的确相当集中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罪恶。

当时这个罪恶社会的首要特点，就是朝廷无道，政治黑暗，“卖官鬻狱，贿赂公行”。西门庆一生的行径就充分地暴

露了这一点。他一上场，就图谋奸占潘金莲，从而毒杀武大郎；接着又勾引李瓶儿，气死义弟花子虚；后又凭借权势，把李瓶儿的第二个丈夫蒋竹山打得皮开肉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他霸占宋惠莲，又要陷害其夫来旺横遭监禁、递解之罪，迫使惠莲自缢身死；而当惠莲的父亲宋仁“叫起冤屈来”，又被西门庆活活地残害了一条老命：

这西门庆不听万事皆休，听了心中大怒，骂道：“这少死光棍，这等可恶。”即令小厮：“请你姐夫来写帖儿。”就差来兴儿送与正堂李知县，随即差了两个公人，一条索子把宋仁拿到县里，反问他打网诈财，倚尸图赖，当厅一夹二十大板，打的顺腿淋漓鲜血。写了一纸供案，再不许到西门庆家缠扰，并责令地方火甲，跟同西门庆家人，即将尸烧化讫来回话。那宋仁打的两腿棒疮，归家着了重气，害了一场时疫，不上几日，呜呼哀哉死了。正是：
……有诗为证：

县官贪污更堪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宋仁为女归阴路 致死冤魂塞满衙。

一部《金瓶梅》里，正是“冤魂塞满衙”！单单一个西门庆，就害死了好几条人命。然而，这个刽子手不但逍遥法外，而且仍官运亨通，并颇有讽刺意味地当上了一个执掌刑狱的理刑官。“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他一旦权在手，也就更贪婪地以权谋私，贪赃枉法，去包庇别人谋财害命。苗青杀主，罪该论死，而西门庆受贿后，一手包天，竟让他顺当地回家进一步侵夺主人的家产，霸占主人的妻妾。这样，“赃迹显著”，何人不晓，被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奏了一本，但结果西门庆用“金镶玉宝石闹妆一条，三百两银子”打点了蔡京，受到惩罚的反而是个曾孝序：被罢官流放，“窜于岭

表”。在这世界上，还有什么王法，有什么天理？有的只是奸险之徒的世上乐园，有的只是善良人们的人间地狱，以及保护这一切的腐烂透顶的官僚机器！

官僚机器何以如此腐败？这是由于组成这架机器的成员都是由私利联系起来的。西门庆原是“一介乡民”，怎么会被太师蔡京一眼看中，平地选拔为“山东理刑副千户”呢？原来只是金钱打动了蔡京的心灵。一手交钱，一手卖官，这笔生意就在第三十回西门庆派来保、吴主管给蔡京送礼时做成的：

翟谦先把寿礼揭帖呈递与太师观看。来保、吴主管各捧献礼物。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靴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绣蟒衣，五彩夺目；南京紵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新，高堆盘榼。如何不喜？……太师因向来保说道：“礼物我故收了，累次承你主人费心，无物可伸，如何是好？你主人身上可有甚官役？”来保道：“小的主人一介乡民，有何官役？”太师道：“既无官役，昨日朝廷钦赐了我几张空名告身割付，我安你主人在你那山东提刑所做个理刑副千户，……”

再看西门庆与蔡蕴的勾结也十分典型。蔡蕴乘着宋代无休无止的党派之争的空子，侥倖地得到了论才学本不该得到的“状元”的桂冠。于是一头倒在蔡京的脚下，“做了假子”。他回家省亲，路经山东时，又得到了太师管家翟谦的特别关照。于是乎，西门庆热情地接待了这位新科状元，临走又送了他“金缎一端，钦绢二端，合香五百，白金一百两”，使得这位蔡状元连声说：“此情此景，何日忘之”，“倘得寸进，自当图报。”（第三十六回）这可以说是两人间的初步勾搭。不久，蔡蕴点了两淮巡盐御史，又经山东，得到了西门庆更为隆重的

接待和奢豪的馈赠。这样，蔡御史就说：“四泉（西门庆号）有甚事，只顾分付，学生无不领命。”一口气答应给西门庆早支盐引一个月，让他轻易地获得巨额利润。接着，西门庆又请蔡御史为苗青之事，在替换曾孝序的宋御史面上“借重一言”。果然，蔡御史对宋御史说了一句“管他怎的”，就将苗青之罪一笔勾消，“放回去了”。写到这里，《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感慨道：

正是：人事如此如此，天理未然未然。有诗单表人情之有亏人处，诗曰：

公道人情两是非，人情公道最难为。

若依公道人情失，顺了人情公道亏。

这里的“人情”就是“私情”，就是完全用一己之私利沟通起来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当时的官僚机器就是靠这种私利维系的。这正如小说中说的：“功名全仗邓通成。”有了钱，就可以做官，就有了一切；为了钱，就可以卖官，就可以出卖一切。在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公道”。那怕是最终为了维护统治集团根本利益的“公道”，也被泛滥的私欲冲得一精二光了。这样的官僚机器，还有什么政治可言？还有什么卑鄙、无耻、凶狠、毒辣的事情干不出来！

“功名全仗邓通成”，那么，这邓通般的富有是从哪里来的呢？是靠正当劳动挣来的吗？不，小说的作者在这里补充了一句话，叫做：“富贵必因奸巧得。”西门庆就是靠“奸巧”敛财而暴发起来的。他原是个“破落户财主”，只是靠一爿生药铺赚钱。小说开始，他接连骗娶奸拐了富有的孟玉楼和李瓶儿为妾，得到了两笔颇为可观的财产。富孀孟玉楼带来的是“南京拔步床也有两张。四季衣服，妆花袍儿，插不下手去，也有四五只箱子。珠子箍儿，胡珠环子，金宝石头面，金镯银

钏不消说，手里现银子也有上千两，好三梭布也有三二百疋。”不过，这比起李瓶儿来还是小巫见大巫。李瓶儿原是蔡太师女婿梁中书的妾，被李逵杀散时，曾带走“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后嫁了花子虚为妻，继承了花太监的一份财产。当花子虚未死时，她就交给了西门庆三千两大元宝，还说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缘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好玩之物”。结果这些“软细金银宝物”，都在夜晚从墙头上偷偷地运进了西门庆的家中。看来，西门庆谋妇，固然是由于好色，但同时也在于谋财。这是他骗钱的第一种奸巧手段。第二种，就是明目张胆地吞没亲戚的家财。他女婿避难投靠他家时，曾带来“许多箱笼”，还另外送了他五百两银子，都被他“收拾月娘上房来”（第十七回）。其价值可能比李瓶儿的还要多，因这里实际上包括陈家及“杨戩应没官的赃物”，“许多金银箱笼”（第八十六回）。第三是受贿。苗青一案，就一下子受贿一千七百两。此外如盐商王四峰被监在狱中，也“许银二千两，央西门庆对蔡太师人情释放”（第二十五回）。第四是放高利贷。西门庆几次借钱给李三、黄四做黑生意，都是“每月五分行利”。第一次借给他们一千五百两银子，黄四后来有一次拿出“四锭金镯儿来，重三十两，算一百五十之数”作利息（第四十三回）。他们之间的交易断断续续一直做到西门庆死。历代对重利盘剥，久有法禁。如元代至元年间，“定民间贷钱取息之法，以三分为率”（《元世祖本纪》），这也重于汉代之什二。而西门庆竟以五分为息，可见其剥削之重。第五是不法经商。西门庆“开四五处铺面，缎子铺、生药铺、紬绢铺、绒线铺。外边江湖又走标船，扬州兴贩盐引，东平府上纳香蜡。伙计主管，约有数十”（第六十九回）。他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牟取暴利。如那个绒线

铺，就是用四百五十两贱买了一批当值五百两的绒线开张的，后来“一日也卖数十两银子”。特别是他开的当铺，赚钱更是昏天黑地。有一次有人拿了“一座大螺钿大理石屏风，两架铜锣、铜鼓、连铛儿”来当，只兑了三十两银子与他，但据说，“这屏风买的巧也得一百两银子与他，少了不肯”，更不要说再加两架“彩画生妆，雕刻云头，十分整齐”，“吹打起来，端的声震云霄，韵惊鱼鸟”的铜鼓、铜锣等了（第五十四回）。西门庆搞的长途贩运，更是想方设法买通官吏，偷逃税银。第五十九回写韩道国运货回家时与西门庆的一段对话云：

西门庆因问：“钱老爹书下了？也见些分上不曾？”

韩道国道：“全是钱老爹这封书，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小人把缎箱，两箱并一箱，三停只报了两停，都当茶叶、马牙香柜，上税过来了。通共十大车货，只纳了三十两五钱钞银子。老爹接了报单，也没差巡拦下来查点，就把车喝过来了。”西门庆听言，满心欢喜，因说：“到明日，少不的重重买一分礼，谢那钱老爹。”

西门庆的富，就是靠这些“奸巧”手段富起来的。据第七十九回他临死前向吴月娘的交代，他家几处商铺和少量外借的银子合起来就有九万一千七百四十两。这当然不包括他家里的大宗积货和藏银。这些横财就在不到五年的时间内暴发起来的。这种“富”正如古人所说的是“奸富”。这种“奸富”只能是极少数人的富。这种少数人的富，完全是建筑在大多数从事正当劳动者被剥削、被拐骗基础上的富。它根本无益于社会财富的创造和积累，而只能将社会的财富蛀空，使大多数人贫穷。但社会竟纵容这批蛀虫，因为就是这批只知个人私利的蛀虫主宰着社会。因而，《金瓶梅》的作者尽力地描绘了西门庆之流以奸巧得富贵，正有力地反映了当时的经济是多么混乱，社会是

多么黑暗！

富起来了，西门庆一方面用大量的金钱来上通权要，钻刺买官，下结地痞，笼络人心，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黑势力；另一方面则用来过穷奢极欲的糜烂生活。他家拥妻妾六位，日日淫欲无度，还要奸污使女，霸占仆妇，嫖玩妓女，乃至私通上等人家的太太。在这里，有好友的老婆，义子的母亲，妻妾的侄女，真是人伦毫无，道德丧尽。当时，一般人们的生活相当贫困。一个使女，只值银子六两（秋菊）、五两（小玉），乃至四两（锦儿）。主管一爿店铺的伙计的月薪也只有二两。而西门庆梳笼妓女李桂姐，一次就化了五十两，还外加四套衣服；招待宋、蔡两位御史，一席间费了“千两金银”，就连从人也“每位五十瓶酒、五百点心、一百斤熟肉”。这就是《金瓶梅》让我们看到的一个暴发户的生活。

西门庆是书中的主角，他一生的所作所为，足以暴露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经济的混乱和道德的沦丧。而西门庆的所作所为，是在与各色人等发生关系中完成的。各种各样的人与他一起组成了一个真实如画的鬼域世界。这里有昏庸的皇帝、贪婪的权奸、堕落的儒林、无耻的帮闲、齷齪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诈的奴仆，乃至几个称得上“极是清廉的官”，如开封府杨时、东平府陈文昭等，也是看“当道时臣”的眼色，偏于“人情”，执法不公。有人说，《红楼梦》中除了一对石狮子外，再也没有清洁的了。这话说得未免过分。大观园中的主人公们还在为取得自以为清洁的东西在挣扎着。而一部《金瓶梅》，除了如武松、曾孝序、王杏庵等毫不重要的配角身上还闪烁着一星正义的火光之外，整个世界是漆黑漆黑的。小说的作者就是把西门庆放在最普遍的联系中来展示，这个世界从整体上来说，是黑暗透顶、腐朽不堪的。

文学暴露社会的黑暗的广度本身就体现着一定的深度。从普遍联系中来暴露黑暗，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些弊病不是偶然的、个别的。但是，文学暴露的深刻性毕竟还应当从多方面来加以考察。作品是否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为最大多数人所关心的尖锐问题和本质矛盾，就是衡量暴露深度的重要界尺。明代中后期，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个个好色贪财，昏庸凶残，以致政事日非，矛盾重重。明神宗年幼时由张居正当道，政治虽略有起色，但于万历十年居正死后，政局大变。这个暴君，“酒色财气”，四病俱重，不可药治。他“每夕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明实录》）。其“好货成癖”（《明实录》），真可谓“敛财之事无奇不有”（孟森《明清史讲义》）。至于嗜色，更属荒唐。不但使整个社会风气日趋淫靡，而且“忠谋摈斥”，直接冲击了朝政。特别因宠幸郑贵妃而欲废长立幼，酿成了十几年争建储的政治漩涡，后果严重。他几十年深居宫中，不接朝臣，以致佞幸擅权，内阁纷争，上为结党营私，下竞夤缘钻刺，吏治败坏，贪污成风。统治集团过着越来越荒淫无耻的生活，广大人民则日益贫困。于是，柔者转死于沟壑，强者揭竿以起义，全国发生了“民变”数十起。面对着这样的现实，忧国爱民的屠隆感到十分痛苦。他在《奉杨太宰书》中说：

隆窃思此时，国本（按：指建储之争）未定，朝议多端，宗室失所，边防懈弛，吏治粉饰，官守贪污，人情倾仄，俗尚浮夸，费用太繁，征求颇急，闾阎空虚，黔首痼瘵。又如以灾情事，大有可虞！夫天下此离，则治平继之；治平之后，所继非复治平矣！

屠隆之所虑，不是和《金瓶梅》所铺叙的画面如同一辙吗？那么，造成这样局面的责任属谁呢？屠隆又说：

……今日水旱沓仍，疫疠继作，去年元元大被其毒，今岁益甚。吴越之间，赤地千里，丧车四出，巷哭不绝。隆窃念主上英明，总揽大臣，宽仁爱人，明良在朝，政刑修举，不应致眚而灾眚若此，此或前人鸷猛束湿之余烈也。

这些话，不是语含讥讽，直指所谓“英明”的主上、在朝的“明良”吗？所谓“此或前人”云云显然是一句托辞而已。假如这段话嫌不够清楚的话，再看其为“告当世，贻后来”而写的《荒政考》云：

夫岁胡以灾也？非王事不修，时有阙政，皇天示谴，降此大眚，则或小民淫侈，崇慝积衅，酝酿沴气，仰于天旸雨暘，恒若水旱为灾。岁以不登，四境萧条，百室枵馁，子妇行乞，老稚哀号，甚而斫草根，剥树皮，析骸易子，人互相食，积骨若陵，漂尸填河，百姓之灾伤困厄至此，为民父母奈何束手坐视而不为之所哉！

这段话，实际上也指出了百姓生活之惨状，完全是由于“王事不修，时有阙政”及“小民淫侈，崇慝积衅”所造成的，归根到底应该由“为民父母”的统治者负责的。《金瓶梅词话》的创作，就是与这思想一脉相承的。它在广泛地暴露那样一个黑暗的社会时，是把矛头指向当时的统治集团乃至最高统治者的，且在客观上把其暴露放在两个阶级对立的背景上的。

请看小说正文开头，作者就特地安排了这么一段话：

话说宋徽宗皇帝政和年间，朝中宠信高杨童蔡四个奸臣，以致天下大乱，黎民失业，百姓倒悬，四方盗贼蜂起，……皆轰州劫县，放火杀人，僭称王号。惟有宋江，替天行道，专报不平，杀天下赃官污吏、豪恶刁民。

这段话，可以说与正文故事并不搭界，但作者就是要用它来开